

编委会主任：雷春美 张燮飞 王光远 李祖可 ○

总主编：苏文菁 ○

闽商发展史 ○

• 漳州卷 ○

郑 镛 主编 ○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总主编：苏文菁
副总主编：许通 陈幸 曹宛红 李道振 谢小燕

闽商发展史

• 漳州卷

郑镛 主编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闽商发展史.漳州卷/郑镛主编. — 厦门: 厦门大学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615-6082-2

I. ①闽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商业史-福建省②商业史-漳州市 IV. ①F72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28957 号

出 版 人 蒋东明

责任编辑 薛鹏志 章木良

装帧设计 李夏凌 张雨秋

责任印制 朱 楷

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39号

邮政编码 361008

总 编 办 0592-2182177 0592-2181253(传真)

营销中心 0592-2184458 0592-2181365

网 址 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
邮 箱 xmupress@126.com

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

开本 889mm×1194mm 1/16

印张 17.25

插页 4

字数 380千字

印数 1~2000册

版次 2016年6月第1版

印次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70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信二维码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博二维码

《闽商发展史》

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

编委会主任：雷春美 张燮飞 王光远 李祖可

编委会副主任：翁 卡 臧杰斌 王 玲 张剑珍 陈永正

编委会成员：

陈爱钦	陈春玖	陈 飞	陈国平	陈建强	陈鉴明	陈景河	陈其春
陈秋平	陈少平	陈祥健	陈小平	邓菊芳	冯潮华	冯志农	傅光明
郭锡文	洪 杰	洪仕建	胡 钢	黄海英	黄健平	黄 菱	黄如论
黄 涛	黄信焜	黄忠勇	黄子曦	江尔雄	江荣全	景 浓	柯希平
雷成才	李海波	李家荣	李建发	李建南	李 韧	李新炎	连 锋
林国耀	林积灿	林荣滨	林素钦	林腾蛟	林 云	林志进	刘登健
刘用辉	欧阳建	阮开森	苏文菁	王亚君	王炎平	翁祖根	吴国盛
吴华新	吴辉体	吴泉水	徐启源	许连捷	许明金	杨 辉	杨仁慧
姚佑波	姚志胜	游婉玲	张琳光	张轩松	张祯锦	张志猛	郑玉琳
周少雄	周永伟	庄奕贤	庄振生				

专家指导组成员：

苏文菁 徐晓望 王日根 唐文基 王连茂 洪卜仁 郑有国 罗肇前
黄家骅

总 主 编：苏文菁

副总主编：许 通 陈 幸 曹宛红 李道振 谢小燕

闽商发展史·漳州卷

编 委 会

主 任:游婉玲 张祯锦 洪仕建 张琳光 庄振生

副主任:林五四 林 青 陈群霞

委 员:蔡 建 曾黄河 张少伟 黄文龙 张镇山 李瑞明

苏艺峰 郭达璐 林百荣 李 晖 刘达文 张炯辉

沈一彬 蔡力颢 蔡丽璇 李涌华 王文智 曾阿生

赖建辉 王建坤 邱清裕 陈展平 林国强 林绍坤

陈振魁 林启明 王胜专 叶小清 杨龙辉 郭义龙

郑 镛

主 编:郑 镛

撰 稿:刘 云 翁 频 黄友泉 覃寿伟 郑 榕 苏惠苹

郑美华 何 池 郑 镛

总 序

闽商是孕育于八闽大地并对福建、中国乃至世界都具有巨大贡献和影响的商人群体,是活跃于国际商界的劲旅,是福建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。千百年来,为了开拓新天地,闽商奔走四方,闯荡大江南北;漂洋过海,足迹遍及五大洲,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参与者与见证者。他们以其吃苦耐劳的秉性,超人的胆略,纵横打拼于商海,展示了“善观时变、顺势有为,敢冒风险、爱拼会赢,合群团结、豪爽义气,恋祖爱乡、回馈桑梓”的闽商精神,赢得了世人的尊敬。

盛世修史,以史为鉴,利在当下,功在千秋。为了不断丰富闽商文化内涵,更好地打造闽文化品牌形象,持续提升“世界闽商大会”品牌价值,凝聚人心、汇聚力量,推进福建科学发展、跨越发展,我们把《闽商发展史》研究编纂工作作为闽商文化研究的重大工程,并于2010年8月正式启动。《闽商发展史》全书十五卷,除“总论卷”之外,还包含福建省九个设区市,港、澳、台、海外以及国内异地商会分卷,时间上从福建目前可追溯的文明史开始。2013年6月,我们在第四届世界闽商大会召开前夕出版了《闽商发展史·总论卷》,并以此作为献给大会的贺仪。今天,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、还带着淡淡的油墨芳香的是《闽商发展史》各分卷。《闽商发展史·总论卷》和《闽商发展史》各分卷都是《闽商发展史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《闽商发展史·总论卷》的总论注重闽商发展历史的普遍性和统一性;设区市卷和港、澳、台、海外、国内异地商会卷侧重展示闽商发展历史的特殊性和多样性,以丰富的史料与鲜活的案例,为福建的21世纪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核心区文化建设增添了厚实的基础,为中国海洋文化、商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本土的文化基因。

欣逢伟大的时代,是我们每个八闽儿女的幸运;实现伟大的梦想,是我们每个八闽儿女的责任。今后,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深入开展闽商文化研究,以闽商文化研究的优秀成果激励广大闽商,引领弘扬闽商精神,让广大闽商更加积极主动地把爱国热情、创业激情和自身优势转化成实际行动,融入“再上新台阶、建设新福建”的伟大实践中,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更大贡献!

中共福建省委常委
省委统战部部长

雷春美

序

漳州是一座拥有 13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,是著名的“鱼米花果”之乡,素有“海滨邹鲁”之称,有着经略海洋的悠久历史和深厚的工商文化,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商业巨子,为漳州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。

明朝中后期,漳州月港作为我国唯一合法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,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,与 47 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,拥有 16 条通往东西洋的贸易航线。特别是从月港经吕宋(马尼拉)至拉丁美洲和欧洲的航线前后持续了两个半世纪,是世界大帆船航海史上维持最久的一条全球化贸易航线,开创了中国以白银为结算货币交易的时代,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长河中,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。月港的兴盛,造就了漳州海商的崛起,他们过台湾、下南洋、通非欧,闯荡海外、万里行商,创造了许多财富传奇。“市镇繁华甲一方,古称月港小苏杭。”丝绸、瓷器、茶叶等商品从东南各地汇集漳州,与本地所产漳瓷、天鹅绒等物品通过月港源源不断地输往海外,番薯、花生、烟草等海外农作物也在万历年间经月港传入,并渐次扩种到全国各地,对我国农业生产影响深远。“东接诸倭国,南连百粤疆。货物通行旅,资财聚富商。雕镂犀角巧,磨洗象牙光。棕卖夷邦竹,檀烧异域香。燕窝如雪白,蜂蜡胜花黄。处处园栽橘,家家蔗煮糖……”这是明代闽县诗人徐渤游历月港后的有感而发、状物抒情,给后人留下无限想象空间。

帆影苍茫,舟楫相望;勇者无惧,迎风破浪。千百年来,这条海上丝绸之路航线,把漳州与世界紧密相连。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宏伟构想,赋予了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崭新的时代内涵。漳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节点,积极融入国家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战略重点,传承月港历史辉煌,立足海洋特色优势,突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、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,全力打造海上丝绸之路先行示范区,为实现国家战略和福建发展发挥更大作用。

2012 年 10 月,漳州与北海、广州、泉州、福州、宁波、南京、扬州、蓬莱等 9 个城市一起被纳入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》,海丝“申遗”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为了配合中共福建省委统战部编纂《闽商发展史》的整体规划,更全面、系统地挖掘漳州海丝史料,弘扬漳州海洋文化精神,我们组织了《闽商发展史·漳州卷》编委会,经数年努力,完成了本书稿。我们希望能通过本卷的出版,从丰厚的历史积淀中吸取营养,

主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,全方位推进与海丝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,以期再现昔日月港的辉煌,抒写今天的锦绣篇章。是为序。

中共漳州市委常委、统战部长 张琳光

2016年3月

前 言

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,海洋与人类的经济生活息息相关。福建南部远古时期为百越之区,孕育出早期的海洋文化。《越绝书》载“越人谓船为须虑,习之于夷。夷,海也”。越人“山行水处,以船为车,以楫为马,往各飘然,去则难从”。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东山发现了晚期智人化石——“东山人”右肱骨化石和更新世时期的水牛、斑鹿、水鹿、中国犀、山羊、熊等哺乳动物化石,为研究闽台民族远古祖先的血缘关系、海峡地区的海陆变迁和古闽台半岛的形成与消失,提供了新线索。位于东山岛南端,年代为距今5000—4300年的大帽山贝丘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海洋动物遗骸,海贝种类丰富,具有强烈的海洋经济特征。所出石铎原材料绝大部分来自澎湖群岛,陶器与澎湖群岛和台湾本岛的很多遗址的陶器相似。大约距今5000年,东南沿海先民开始向南太平洋、印度洋传播文化。东山大帽山、云霄尖子山贝丘遗址的发现表明,新石器时代的漳州先民已掌握了较高的制作贝器、石器、陶器和造船技术。为了生存,他们以舟楫不断向海洋拓展,具有深厚的海洋传统与特质。

战国时期,越人已以循岸梯航的形式沿海岸线到达东南亚进行海上贸易,楚国曾从百越那里得到珠玕、犀象、犀角、象齿等物产。入汉,闽越人仍是以“习于水斗,便于用舟”著称,南抵越南,北达江淮,奔驰海上,为日后闽南海外交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继汉六朝的东冶港、唐五代的甘棠港之后,宋元时期的刺桐港发展成为东方著名大港,福建的海外交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唐初建置的漳州经唐五代以及北宋初的开发建设,经济社会初具规模,商品经济有所发展,海外贸易也渐露头角,沿海的新兴市镇应运而生,漳州海商已经活跃于海外贸易领域,北抵高丽、日本,南达“南蕃”交趾、占城、真腊、三佛齐诸国,私贩香料、犀角、象牙。至南宋,史料出现唯一的海商姓名——黄琼,“商贩南蕃”而“空舟来归”。此时漳州输出的商品以丝绸、茶叶、瓷器、铜钱为主,输入则以香药、珠宝为多。至元代,漳州海外贸易持续发展,蕃舶大多在泉州市舶司抽解后到达龙溪海口镇和漳浦敦照镇。同时,在两宋造船业初具规模的基础上,元代漳州的造船业也有长足的进步,沿海居民世代相承的航海技术更臻于成熟。

进入明代以后,由于受到元末战乱的影响,加上明朝统治者推行海禁和朝贡贸易政策,曾经名扬中外的泉州港海外贸易江河日下,大不如昔。成化十年(1474年),福建市舶司移置福州更使泉州港雪上加霜,迅速走向没落,而明初盛极一时的福州港在明中叶之后,伴随着朝贡贸易的衰微也越来越不景气。与此同时,福建沿海一批港口却因走私贸易的兴盛得以迅速崛起。

明代从事海上走私的商人,为躲避官府的剿捕,在海上漂泊不定,活动范围很广,流动性很大。他们顺风汛航行,当南风汛时,由广东至福建、浙江,而直达江洋;北风汛时,或上岸剽掠,亦寇亦商。因此一些港汊曲折,封建政府难以驾驭的港湾岛屿就成为他们活动的据点,在这里造船置货,纠党入番。回航后与来自各地的商人贸易番货,沿海百姓也为重利所诱,“人首(皆)竞趋之”,接济走私商人,“反取柴米酒肉以馈之,打造枪刀铅銃以助之,收买货物以盗之,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”。每当窥知官兵的剿围动静,则星夜驰往报警,若官府令他们哨探,却推避不从,“宁杀可爱之身,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”。即使是“三尺童子,亦视海贼如衣食父母,视军门如世代仇讎”。当时福建走私贸易港口如“漳之诏安有梅岭,龙溪海沧、月港,泉之晋江有安梅(海),福宁有铜山。各海澳避远,贼之窝响,船主、喇哈、火头、舵公皆出焉”。此时漳州的月港、梅岭港应是最有影响的走私港。

16世纪下叶,东亚海域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,东来的欧洲殖民者为了开拓国际市场,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展开了激烈竞争。西班牙殖民者为维持其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,开辟了从马尼拉到墨西哥阿卡普尔科的“大帆船贸易航线”;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建立大本营后,为了打开直接对华贸易的大门,不惜动用武力侵占我国的澎湖岛与台湾南部;葡萄牙殖民者则利用留居澳门的优势,经营着对日本、马尼拉和南亚的三角贸易。而此时在中国国内,明朝政府经过“嘉靖倭患”的沉重打击后,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,不得不考虑改变海外贸易政策,有限度地开放海禁,准许私人申请文引出海贸易。

隆庆元年(1567年)明政府部分取消海禁令,在月港开设“洋市”,月港从此进入了全盛期。万历年间(1573—1620年),月港的繁荣达到了顶点,“四方异客,皆集月港”,月港已是闻名遐迩的国际港口了。周起元在《东西洋考·序》中描绘道:“穆庙时,除贩夷之律,于是,五方之贾,熙熙水国,剡舲舳分市东西路,其捆载珍奇,故异物不足述,而所贸金钱,岁无虑数十万。公私并赖,其殆天子之南库也。”

与国际贸易相接轨的月港是16—17世纪我国东南地区海外交通贸易的中心,是这一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,其历史地位相当重要。

一、首开我国民间海外贸易的先河

从隆庆元年(1567年)至崇祯五年(1632年),漳州月港至少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繁盛。况且,是以合法的民间贸易港的身份跻身名港之列。所以,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。它结束了明代前期维持近200年的朝贡贸易,使明代后期的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;它标志我国历史上持续1000多年的以官方垄断为主的海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变化,使我国海外贸易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。

就明代而言,官方朝贡贸易主要是为了在政治上“怀柔远人”,建立宗主国的地位,而不是在经济上牟取利益。如《皇明名臣经济录》云:“我祖宗一统无外,万邦来庭,不过因而羁縻而已。非利其所有。”因此,贸易形式以朝贡赏赐方式进行,而非支付货款。对于来华朝贡人员,皆以使臣接待,礼遇甚厚。如琉球贡船到达后,福建市舶司设宴“款待夷官,赏稿夷众”,贡使回还之日,鸿胪寺派员护送,携带的赏物和货物,沿途差派车夫搬运,

然后,给予海上所用食米,护送出海,开洋回国。所以每次接待贡使,所费甚巨。如正统四年(1439年),因接待琉球贡使,福建市舶司花费一大笔钱,据福建监察御史成规奏报“琉球国往来使臣,俱于福州停住,馆款之需,所费不貲……及今未半年,已用铜钱七十九万六千九百有余”。因此,官方海上贸易,不仅无利可图,而且给国家财政,给人民造成很大的负累;而私人海上贸易却不同,他们经商目的,不是为了自己的消费,而是为着追求高额的商业利润,正如傅元初在《请开洋禁疏》中提出:“海滨之民,惟利是视,走死地如鹜,往往至岛外欧脱之地。”就与日本贸易而言,官方朝贡贸易,由于赏赐过多,接待过多,费用过大,每次都大亏本,但对日的私人海上贸易无不获利数倍,如丝在日本“每百斤值银五六百两,取去者其价十倍”,丝绵“常因匮乏,每百斤价银二百两”,铁锅“大者至为难得,每一锅价银一两”。正因为商业利润很高,出海贸易的月港海商,满载而归,由此致富。如月港海商洪迪珍“载日本富夷泊南沃得利,自是岁率一至,致富巨万”。

官方朝贡贸易主要输入各种“海外奇珍”的高级消费品,如安息香、龙涎香等高级香料,犀角、羚羊角等高级药材和孔雀、白鹿等珍禽异兽,以满足皇帝、贵族、大官僚、大地主奢侈生活的需要;而私人海外贸易的商品,除了一部分奢侈品外,更多的是各种手工业原料和手工业产品,如出口布、绢等纺织品;碗、壶等日用陶瓷;雨伞、草席等生活用品。进口夏布、白棉布等棉织品和木棉、吉贝等纺织原料,及木材、生漆等商品,是供一般地主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需要,为民营手工业提供原材料。

据《东西洋考》记载,万历年间,从月港进口各种货物 115 种,其中金银器皿、奇珍异兽等高级奢侈品基本断绝,而草席、番纸等日常生活用品大大增加,由从前 5 种增加到 25 种,占全部进口商品的 20%。纺织品也由官方海上贸易的剪绒丝、杂色红花被面等高档商品变成粗丝布等低档商品,此外还新增加红花米、绿豆等农副产品。进出口商品构成的变化,使福建的海上贸易由入超变成出超,阻止了宋元以来铜、银大量流出的趋势,开始出现外国银圆大量流入的新局面,从而对福建经济乃至全国的货币流通发生深远的影响。

二、首度参与国际贸易竞争

16 世纪初,西方依靠海上势力崛起的大国东向扩张,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,逐鹿海上,浊浪滔天。在南亚,东南亚战略要地建立要塞,并视中国商船为强敌。葡人占领马六甲,“与华人酬酢,屡肆辘张,故贾船希往者。直诣苏门答刺,必道经彼国。佛郎机见华人不肯驻,辄迎击于海门,掠其货以归。数年以来,波路断绝。然彼与澳夷同种,片帆指香山,便与粤人为市,亦不甚藉商舶彼间也”。中国商船在麻六甲的处境相当艰难,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局。面对凶险,谁与争锋?月港海商以大无畏的精神,为逐利而忘生死,依然以中小型海船扬帆远航,参与国际贸易竞争,其胆魄和能力对后人极具启发意义。

月港开放之初,并不限制出洋商船的数量。从万历十七年(1589年)开始,限定每年出洋商船的数量为 88 艘,后来增至 110 艘。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,总数达到 137 艘。作为月港一港而言,每年有上百艘商船扬帆出洋,是甚为可观的。以每船约载 300 人计,

每年从月港出洋经商者,至少有 3.3 万人。

月港海商以诚信为本,为东南亚经商地提供了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,也为国内提供了大量的白银。1615 年,荷印总督燕·彼得逊·昆就写信告诉十七人委员会:“到万丹贸易的中国船上的人们售卖的丝绸比我们的好,在市场上的卖价比我们货单上开的便宜三分之一,因为对他们来说,时间和需要就是法律。……由于我们和英国人今年都缺乏现钱,故中国人离开时手上还留下大量的丝绸,如果我们给予现钱,有可能比去年便宜一倍。”贩运到暹罗贸易的瓷器也是由于卖价太低,而使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职员感到迷惑不解:“除了他们在中国买这些瓷器的确非常便宜,否则他们将无钱还本”,“我们不能想象,他们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,除了他们懂得如何把回航货物在国内卖高价”(《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》)。即使到马尼拉贸易的海商可赢得较高的利润,但这些利润并不是实际贩运货物所得的利润,而是依靠两国之间白银的差价。拉斐尔·伯纳尔在《马尼拉华人居留地》一文中就直接指出:“中国人在与马尼拉贸易中的赢利,并不取决于降低中国商品的价格,而取决于白银在中国的价格高。换言之,中国人不是以降低商品价格来与西班牙人、菲律宾人或墨西哥人竞争,他们按自己的价格售卖,而换回的是白银,白银在中国比在西班牙可获得较高的价格。”

以往中国的海外贸易,大都是外国人入市,中国商人为坐商。月港海商则为行商,扬帆出海分贩东西洋,经商范围十分广阔,东起日本、朝鲜,中经菲律宾群岛,直到南洋各国,到处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。嘉靖年间,前往日本的福建海商,因遇台风,漂到朝鲜就有 1000 多人,如王乞乘坐的一条大船在朝鲜黄竹岛停泊,同船的福建海商共 150 多人。直接到日本经商的福建商人更多。“嘉靖甲辰,忽有漳通西洋番船为风飘至彼岛(指日本),回易得利,归告其党,转相传走”,于是出现大量通倭现象,“今虽山居谷汲,闻风争至,田亩之夫,缀耒不耕,贵贷子母钱往市者,握筹而算,可坐致富也”。

到菲律宾群岛的福建海商也大量增加,尤其是隆庆、万历年间,部分开放海禁以后,去吕宋的闽南海商更多。何乔远指出“其地闽漳人多往焉,率居地曰洞内者,其久贾以数万”。在漳州的族谱中,也留下许多福建海商到吕宋贸易的记载。

南洋群岛与中南半岛各国是福建海商活动的又一重要地区。据闽南族谱记载,明末清初,龙溪许良辑等 2 人,海澄谢汝棋等 28 人“前往生理”。

17 世纪闽南海商由月港出洋经商人数较多,分布较广,从而改变了长期以来外商来华贸易为主的倾向。所以张燮的《东西洋考》说:“市舶之设,始于唐宋,大率夷人入市中中国,中国而商于夷,未有今日之伙也。”

三、首创民间海外贸易的管理机制

成、弘年间,月港的海外贸易迅速崛起,出现了“货物通行旅,资财聚富商,雕镂犀角巧,磨洗象牙光”的繁荣景象,成为闽南一大都会,享有“天下小苏杭”的盛誉,到正德、嘉靖之际,月港进入前期最繁盛的阶段,月港海商与海外各国的走私贸易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,“闽漳之人,与番舶夷商贩番物,往来络绎于海上”,月港“豪民私造巨舶,

扬帆外国,交易财利,因而诱寇内讧,法不能止”。

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,明政府加强对海商的控制。嘉靖九年(1531年),根据巡抚都御史胡璉的建议,把巡海道移驻漳州,并在月港东北10多里的海沧澳建立安边馆,委各府通判一员驻扎,半年一易。嘉靖三十年(1551年),复于月港建立靖海馆,以“通判往来巡辑”。不久,海盗商人谢志占据月港,接着,海商张维等二十四将又“结巢盘踞”,使政府完全失去控制,月港地区“殆同化外”。于是嘉靖四十二年(1563年),巡抚谭纶下令招抚,“仍请设海防同知,颀理海上事,更靖海馆为海防馆”,由海防同知驻扎。隆庆、万历年间,为了征收商税,加强管理,才把海防馆改为督饷馆,馆址在“县治之右,即靖海馆旧基”。从明朝政府相继在月港设立安边馆→靖海馆→海防馆→督饷馆的过程,可以看出虽然督饷馆是从安边馆、靖海馆、海防馆发展过来的,但安边馆、靖海馆、海防馆主要是对月港海商的镇压机构,而督饷馆才真正是对月港海商的管理机构。

为了管理月港海外贸易,明朝政府不仅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,而且制定了一些管理法令与条例。

商船进出港口的管理办法:月港海商出海贸易,首先要得到明政府的批准,由海防官发给船引后,才能起航,每张船引“征税有差,名曰补税”。每次请引以100张为率,每一张船引都要详细填写船商的姓名、年貌、户籍、住址、开向何处、回销日期,以及限定的器械、货物等商品名称,“商众务尽数填引,毋得遗漏”,同时海防官及各州县要设置循环号簿2扇,照商引登录器械、货物、姓名、年龄、户籍、住址、向往何处、期限等,“按日登记。”如所报有差错,船没官;如货物斤数不同,货没官。

商船出港时,由督饷馆派人登船验引,防止夹带各种违禁品及兵器出口。出海商船经过盘验,果无夹带违禁货物出洋,方许封识开驾。

商船回航经过南澳、浯屿、铜山诸寨及岛尾濠门、海门各巡司时,先委官订封,逐程派舟师护送,名曰“以防寇掠”,实际上是防止地方小艇,先出海外接载饷货。进港后,船商要立即抱引送院复查缴销。如有越贩回澳,弃船登岸,盗盘货物漏饷者,将人船擒获解治。此外,对商船往来程限也有规定,西洋遥远,则每年十一二月发行,严限次年六月回销。东洋稍近,多在春初驾往,严限5月内回销,在外压冬未回者,严拘家属监禁,即使没有通倭情弊,亦必罪以违限。

商税的征收办法:月港海商的税收制度由从前的抽份制改为饷银制。这种商税共分三种:一为水饷,也称“丈抽法”。类似近代的船钞,其定税率不以船的载重量,而以船的广狭为准,按照船只大小而征收船税,出之船商。二为陆饷,即商品的进口税。是按出口货物的多寡或价值的高低来计算的,征之于购买进口货物的铺商。三为加增饷,是专门征收从吕宋回来的商船税,一般由船主负担。

以上三种税都是货币税,从贡舶贸易抽分实物税到征收货币税,这是中国关税制度的重大变化,反映了明代对外贸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新的封建海关管理制度由此发轫并发挥长远的影响。

海外贸易的兴盛、漳州海商集团的形成也催生了一批有识有为的士人,他们为开放海禁鼓与呼,为航线畅通标和记,对月港盛况进行全景式纪实。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诏

安的吴朴和龙溪的张燮。前者编撰了我国首部刻印的水路图录——《渡海方程》，后者著作《东西洋考》是当时海外贸易的“通商指南”，全面系统地介绍海外情状和月港商贸管理等规定以及航海、气象、地理等知识，为之后的海交史地书籍提供了编纂范例，特别是为后人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海交史料。

清代漳州行政建制更为完备，交通网络四通八达，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但是，明末清初连绵不断的战乱，使漳州月港在兴盛了几十年后陷入衰退境地。郑成功领导的反清复明军事集团与清军拉锯式的战争持续了近40年，尤其是原郑成功部将后降清为海澄公的黄梧提出“平贼五策”被康熙采纳，其中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，漳州沿海十室九空，百姓流离失所，正常的海上商贸通道被生生切断。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清廷统一台湾后，在厦门设置“闽海关厦门衙署”，并规定厦门是与鹿耳门港对渡的唯一正口，一时商船云集，货积如山，而漳州则成为山海货物交易的中转仓储之地。但在经济运行的原动力驱使下，原有的海港仍有较小规模的海商出入，其中月港、石码港、铜山港、梅岭港以及五澳、浯屿、佛昙、旧镇、宫口、下寨等港是重要的私人海商贸易据点。

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，清廷撤闽、浙、江三海关，规定外国番商“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”，广州成为吸引商业资本的一大磁石。龙溪的潘振承创办了同文行，诏安的叶上林创办了义成行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潘振承被清政府选任为广州十三行商总。

同时，一部分漳州商人前往南洋谋求发展，如诏安黄世钮兄弟到马来亚、漳浦戴文水往新加坡、漳浦杨士让到暹罗，均经商而致富。也有相当一部分漳州海商前往澳门，从事东西洋贸易。台湾纳入清版图后，漳台贸易十分活跃。龙溪角美的林平侯入台经商致富，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年）回原乡建林氏义庄，历四代人，延116年持续赈济，遂成漳台血肉相连之佳话。史料表明，清代漳州海商还是拥有雄厚财力的。

民国时期，漳州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育、成熟，内陆港口不断兴起，山区圩场日臻完善，成为闽西南一大商业重镇。此时，漳州的金融组织也呈多元状况，银行、钱庄、保险、典当并存。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，龙溪县流传乡菲律宾华侨郭有品创办了漳州第一家民信局，后改名天一信汇总局，经营侨批、汇兑，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跨国邮政、汇兑机构。

民国时期的漳州商人如林和坂、林秉祥、杨在田、郭春秋、林文庆、杨纯美、庄西言、吴学谦、郭美丞、张荣汀、张笃生、李荣生、萧佛成等均在南洋经商致富，成为著名的华商。他们大都心系故乡，反哺祖地，为漳州的革命事业、抗日御敌、社会发展贡献力量。

1949年9月，人民政府接管漳州，采取措施恢复发展经济，扶持手工业生产。当年10月1日成立漳州第一家国营商业企业——漳州贸易公司，对平抑物价起了一定作用。1953年起进入计划经济时期，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。对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粮食、生猪、主要经济作物实行统购统销和派养派购等政策；对私营商业采取“利用、限制、改造”政策，并逐步改造成为公私合营商业。1958年后，经行业改造的个体手工业由合作社升级为厂，但效果不佳。1961年再进行调整，局面有所好转。漳州重工业起步于1949年冬，至1965年共有重工业24家。同时，轻工业也得到长足的发展，1952年8月，漳州贸易公司撤销，同时成立百货、粮食、土产三个国营专业公司。1957年成立漳州百

货采购批发站,建立了以二级站为骨干、三级站为基础的国营百货商业网络体系。漳州地区生产的日用工业品,自1956年起由商业部门收购经销。1966—197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,工农业生产受到冲击,商业也呈凋敝状态,除个别从事少量农副产品零售的小商贩外,因打击“投机倒把”,个私商人几乎绝迹。

结束十年浩劫,漳州与全国各地一样,翻开了改革开放的新一页。从1978年到2011年,立足实际、勇于探索、科学决策,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探索并践行“大念山海经”“工业立市”“依港兴市”“生态建市”等发展路径,各项事业迅猛发展,工商业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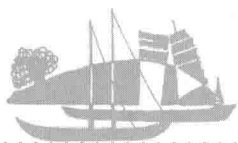
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,漳州重视经营“菜篮子”“果盘子”,开发水果、水产,形成“山上茶果竹,田里稻菜菇,海养鱼虾贝”种养模式,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。同时,电力、水利、交通等基础建设成效显著。2000年后,漳州根据形势发展,加快了工业化进程,制定和实施了若干切合实际的措施,提升了全市工业总体素质,同时也奠定了依港立市的坚实基础。2006年,漳州市委、市政府制定了“依港立市、工业强市、开放活市、科教兴市”的发展战略。同时,注重环境整治和保护,着力建设“田园之都、生态之城”,富美漳州一步步走近时代、走近百姓。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后,有着港口优势的漳州率先与台湾发展贸易往来,最先开展对台小额贸易。至1988年,全市累计对台小额贸易出口2.28亿美元,约占全省的25%。1979年龙溪地区设东山、石码2个口岸和6个起运点,直接经营外贸出口业务,改变了1956年以来由厦门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包揽漳州外贸的局面。1990年后,漳州辖区内海关、商检、港务等机构日臻完备,东山、石码、宫口、古雷、旧镇等港口日趋繁荣,一些企业也开始走出国门,与世界接轨,商品运销四大洋、五大洲。

涛声越千年,风起再扬帆。漳州既有古代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的辉煌,又拥有独特的区位,更具备与国际并轨的港口、产业、商贸、人文等基础,新一代的企业家正意气风发地融入21世纪“海上丝绸之路”建设,融入创造历史、影响未来的时代大潮中。

目 录

contents



第一章 宋元时期漳州的商业与社会/1

第一节 宋代以前漳州的沿革与发展/1

- 一、宋代以前漳州地区的行政隶属变化/1
- 二、宋代以前漳州的经济开发/3
- 三、宋代以前漳州的商业/9

第二节 宋元时期漳州的地理交通与贸易路线/13

- 一、宋元时期漳州的地理交通/13
- 二、宋元时期漳州的贸易路线/22

第三节 宋元时期漳州商业的发展/23

- 一、宋元时期漳州的经济状况/23
- 二、宋元时期漳州的市场管理与政策/40
- 三、宋元时期漳州的市场体系/41
- 四、宋元时期漳州的物产与主要商品/41

第四节 宋元时期漳州的商业资本与商人/45

- 一、商业资本与经营方式/45
- 二、商人与贸易/46

第五节 宋元时期漳州的海洋经济与社会变迁/47

- 一、漳州的海港与潮汐/47
- 二、对外贸易的经营模式/50
- 三、海神信仰的精神生活/55

第二章 明代漳州海外贸易的兴盛/56

第一节 明代漳州商品经济的发展/56

- 一、农作物的多样化/56
- 二、手工业的进步/59
- 三、造船、航海技术的提高/61

第二节 海禁与走私贸易/64

- 一、明初的厉行海禁/65

- 二、走私贸易的悄然进行/66
- 三、倭寇的侵扰/68
- 四、葡萄牙人在漳州的活动/71
- 第三节 开海禁与置海澄/74
 - 一、严禁与弛禁之争/74
 - 二、海澄设县及意图/79
 - 三、隆庆月港部分开禁/83
- 第四节 月港饷税征收的制度化/87
 - 一、督饷馆的设置/87
 - 二、饷税的征收/96
 - 三、饷税征收的弊端/103
- 第五节 明代后期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/107
 - 一、私人海外贸易商及其经营方式/107
 - 二、私人海外贸易对象及贸易网络/113
 - 三、进出口商品/116
 - 四、漳州民间海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/120

第三章 清代漳州商业与商人/125

- 第一节 清代漳州商品经济发展/125
 - 一、清代行政区划变动与海陆交通网络 /125
 - 二、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商品化/127
 - 三、手工技术进步与手工产品的商品化/129
 - 四、商业政策变迁与商业管理机构/131
- 第二节 清代漳州国内商业活动/134
 - 一、清初市镇兴起与市场体系形成/134
 - 二、商品流动与商人活动 /135
 - 三、以会馆为纽带的商业网络/137
 - 四、商业资本与商业组织方式/141
- 第三节 清代漳州海外贸易状况/143
 - 一、清初海禁与商业资本的转移/143
 - 二、清代华南海商集团中的漳州商人/145
 - 三、海外贸易网络与贸易结构/146
 - 四、海外贸易与地方社会的影响/149
- 第四节 清代漳州与台湾两岸贸易/156
 - 一、清代漳台两岸港口贸易网络/157
 - 二、郊商与漳台两岸贸易/158
 - 三、漳台两岸贸易结构/161